



彭绍辉陇东往事

□ 刘志洲

抗大七分校的女生队是一支独特的队伍，她们的到来为抗大七分校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采。面对生龙活虎的男队员，女队员也毫不逊色，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大生产战争的胜利。

纺线是女生队的拿手好戏。纺线时，女队员坐在窑洞前的广场上，围成一个大圈，人手挥动，纺车飞转。除了纺线，女生队还承担了织毛衣、毛袜和做棉军服的任务。在制作棉衣的过程中，心灵手巧的姑娘们就到山上挖来核桃、酸枣、杏树等树根，将根皮熬成多种颜色的水，再试着调色制成多种颜色，把毛线染成咖啡色、黄色、深灰色、浅灰色等，然后织成多种颜色、多种花样的毛衣、毛袜，解决了部队的过冬御寒问题。

劳动生产改善了生活，又锻炼了思想，锤炼了意志。在彭绍辉等同志的带领下，到1944年底，抗大七分校共开垦荒地6万余亩，生产粮食折合细粮共5650余石，养猪1300多头、羊1100余只、牛100余头，实现了粮食和蔬菜的全部自给自足；还先后建起木工厂、肥皂厂、造纸厂、粉坊、磨坊、酒坊等，全分校官兵不但能吃饱饭、有木炭烤火，每人还发了毛衣、手套、毛袜。年底在东华池大礼堂举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及展览会。表彰了大队级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72名，评选出校级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22名、先进单位6个。展览会上，共展出530多件手工作品和100多幅图表，以连环画的方式宣传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先进事迹，进一步发扬了抗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丁建民、李振民等学员还被推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和表扬。

从1943年冬到1944年春，抗大七分校开始了大练兵活动。在豹子川新建成的大操场上，一队队身穿灰色军服的年轻士兵正

在进行射击训练。校长彭绍辉亲自到训练场，独臂举枪进行示范，讲解瞄准的要领，使学员深受启发。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学校还组织学员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校工队和各大队经常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他们用床单作道具，脸盆当乐器，创作并演出了《豹子川大合唱》《难民区》《解放宁条梁》等歌舞和剧目，吸引周边数十里的老百姓前来观看。他们还根据每个阶段中心工作组织文艺宣传队，深入村头和院落，给老百姓演戏唱歌，进行抗日宣传，《兄妹开荒》等节目，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很受欢迎。

1945年，彭绍辉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亲切接见了彭绍辉。他热情地拉着彭绍辉的右臂，对身边的人介绍说：“绍辉同志是瓦子坪人，是我的老乡，放牛娃出身哩！”又对彭绍辉说，“我记得我们在老家见过面。”彭绍辉也激动地回答：“主席，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您是在1927年1月10日。当时您回到老家考察农民运动。”毛泽东用家乡话说：“噢，你哪个有这么好的记性？”彭绍辉答：“那时候见到您就像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怎么不记得呢？再说，我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毛泽东笑着说：“绍辉啊，你坚持记日记的习惯好啊！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日记就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啊。”

紧接着，毛泽东又询问起抗大七分校的办学情况，彭绍辉做了详细汇报。他介绍了如何搭茅棚、挖窑洞、开荒播种，如何修房屋，烧木炭，如何冬季练兵、开展文化和专业学习，大批基层骨干从七分校走向各个部队等。当毛泽东听说抗大七分校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名学员、700多位教职工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孔夫子是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七分校的师生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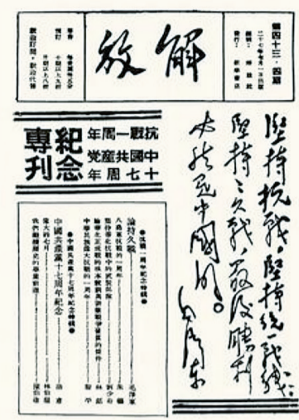
批离校，奔赴前线参加解放战争。1945年9月，抗大七分校第三大队首先重返晋冀鲁豫前线。10月下旬，校部和第一大队在彭绍辉带领下奔赴晋绥边区，第二大队数百名学员返回延安，分配到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工作。11月24日，按照中央军委通知，抗大七分校办学结束，第一大队学员全部结业，其中一部分学员分配到吕梁军区，一部分学员赴东北北满。

彭绍辉担任校长时的抗大七分校在陇东的三年，是战斗的三年、自力更生的三年、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三年，为我党培养了5000多名党政军优秀干部和通信、机要、测绘、文艺、医务等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这也是陇东革命斗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三年，虽然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学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学员和群众之间情同手足，同甘共苦，陇东一部分有志青年深受感染，积极加入抗大七分校的队伍，走上了革命道路。

抗大七分校结束后彭绍辉立即奔赴全国解放战争前线，先后任吕梁军区副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吕梁军区司令员。1948年7月起，彭绍辉任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7军军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彭绍辉历任西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1955年，彭绍辉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他协助叶剑英元帅组建军事科学院，并亲自组织编辑4个野战军的《战术资料汇集》，编制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战斗条令和共同条令，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和军事科学研究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连载下·全文完)

中共首次举办“七·一”庆典



□ 周文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斗争形势严峻，10多年一直未在社会公开，也没有记载建党历程的资料，更没有纪念党的诞辰活动。

1936年，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的文章，提到党的诞辰是1921年7月，但未写明具体日期，这是在公开出版物首次披露建党时间。

193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积极分子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今天是七月一日，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六周年。”这是中央领导第一次把“七月一日”与“建党周年”联系在一起。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讨论会上，提出要核实“建党的准确时间”。当时，延安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曾出席党的“一大”，时光已过17年，虽两人都努力回忆，只记得是1921年7月下半月，但不能确定哪一天。（新中国成立后经专家考证是7月23日）周恩来在讨论会上提出：“纪念党的诞辰目的是督促、警省我们不忘党的宗旨、使命，应该把建党日定在七月初，有开头、起步的深意。”经过热议，得到大家一致认同。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党的领袖首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建党纪念日。同年6月14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召开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体联席会议，决定从7月1日至7日，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及抗战一周年”纪念周活动。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指示各单位、部队要在“七·一”建党“纪念周”，力所能及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第43、44期出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专(合)刊，封面是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新中华报》《群众》等报刊也都相继以大字号、大版面刊登纪念党的诞辰文章。

193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首次举办诞辰“纪念周”庆典，延安街头彩旗飘扬，商铺、合作社等门市都粉刷一新，旧宣传画、标语都换上了新颜。上午10时，延安各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大会开幕，会后，数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宣传和文艺演出活动。傍晚，延安几乎全城空巷，各机关、部队、学校等团体的人员和群众，汇聚南门外公共体育场，参加“庆祝建党十七周年”提灯大会。7时许，“体育场”上空回荡起万众齐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接着由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致辞，他铿锵有力的讲话，不时引发雷鸣般的掌声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

讲话结束，提灯游行开始，最先点亮的是中央机关制作的5米多高的宝塔灯，“抗大”第五大队制作的3米多高的“五星·斧头·镰刀”灯，在两座巨型灯的引领下，五颜六色的飞机灯、坦克灯、战舰灯、炮弹灯、葫芦灯、南瓜灯等数千盏提灯相继点亮，从南门有序排列前行，登高远望，辉映整个延安城亮如白昼。灿若繁星、蜿蜒如龙的提灯所到之处，群情激昂、歌声、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表达解放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热爱、敬仰。

第二天，纪念周的“部队日”“青年日”“工商日”“学生日”等庆典活动陆续举行，每天以军事比赛、文艺演出、艺术展览、演讲会、报告会等突出各自特点的形式纪念党的诞辰。

中国共产党举办首次“七·一”庆典，激发起广大军民对党的无限热爱，更加坚定了他们团结一心、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唐诗风雅传古今

□ 王家年

将诗牌列于社会上流行的各色游戏之中。

诗牌的制式和材质是多姿多彩的，材质有象牙、木材、竹材及纸制的。制式大小尺寸类似牌九、麻将牌、指甲牌。稍长一些的，可以两端各写一字，当两张牌用。短小见方的多写一单字，部分亦有两面使用的。诗牌上所刻字的平仄声分别以朱墨两色来区分。多数是平仄各三百张，也有各四到六百张的。全在乎参与者的喜好，所选大都是被认为典雅的作诗常用字，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虚字等要各占一定比例，以便成句。然后将它们贮于绫缎缝制的锦囊中由诗人们或自摸或分发，各人必须根据自己所拈之韵作诗。

诗牌的游戏规则，吴兴庚阳王良撰《诗牌谱叙》说：“近岁于吴兴王慎卿席上出诗牌为令，人分二十字，叠字为诗一句，不限五七言，能者胜，劣者则有罚，赏以酒，或限时赋诗，辄欢笑无厌，明慎卿出斯谱曰：此余于金陵朋辈家见而录之，惜其传未广也。予熟视谱中如分韵、立题、用字、借字、磨奇、焕彩总其式十有六，此则其要妙，慎卿席上所出，盖小变谱中之意，俾人易从耳。”

有把全副牌分成四份，四人中有一人牵头，称为诗伯，由他用摸牌数笔划等方法，指定每人用哪一份牌和用什么韵，然后每人报出共有多少韵字和便于咏作的诗题，开始构思拼写。诗体是大家商定的，用字也有约定的借代方法。叠字可用空一格表示。或由主持诗会者随意抓取后分发，每人每次数字十字，这往往视人数和规则而定。各人即根据自己手中所拥有的诗牌字数凑集搭配成诗。诗的句式



五、七言不限，或由诗会事先说明，限五言或七言诗二句，共一联，要求语意新奇，平仄协调，对仗工稳。

诗牌是汉字诗学的游戏，也是意象思维的游戏。有一种是竞赛性稍强一点的玩法，见于民国九年五指山人编写的《诗牌新谱》。游戏时按座次轮流摸牌。假设4人作五言绝句，每篇首诗20字，每人先摸到19张牌；头家摸20张，要先打出一张。次家认为有用就收起，同时要打出一张。次家认为无用就问再下家，下家不用，他就摸一张牌，打出一张。用这种玩法可不要轻易弃置任何一个字。几轮以后，有人收到最后一张有用的牌，作出五言四句的一首诗，就是头一位赢家。再宽限一定时间，争取有第二个赢家，或形成更多佳句。最后推敲词句，评定优劣。诗牌游戏规则门类繁多，还有字、魁斗、蝉联、碎联等名目。

· 珍赏 ·

这套清晚时期象牙刻组字诗牌，有792枚正方形诗牌以象牙制成，其中红、蓝二色各396枚，每枚均双面阴刻小楷汉字，并填色用以区分游戏双方，正面字体较大且居于正中，背面则按平仄将音形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缩小刻于右上角，为旧时文人组诗游戏用品，用于饮酒、茶会、雅集等活动之中，即可比武试才情，亦可娱乐。这套诗牌有原配木盒及拼字木托。

汉语大辞典对“诗牌”的释义：一是用以题诗的木板；二是指题上诗的木板；三是韵牌，刻诗韵上下二平声为纸牌式，每韵一叶，总三十叶，山游分韵，人取一叶，吟以用韵。见明屠隆《考盘余事·韵牌》；四是文人游戏，各以牌分取杂字，缀成韵语，是牌亦曰诗牌。

明代的“诗牌谱”有多个版本，明万历王良枢编辑，周履靖校续，有影印万历二十五年金陵荆山书林刊本《夷门广牍》卷五十二“娱乐类”中，讲了诗牌的制式、游戏规则。康熙年间，诗人王渔洋在所著《香祖笔记》上谈诗牌，将其与集句诗相提并论。当时诗牌游戏相当流行，都是文士，包括有能力刻印诗集的人物。李家瑞所著《停云阁诗话》记载，道光晚期在福建任过知县的张辛田，曾约他一起用诗牌作律诗若干首。金武祥在《陶庐杂忆》中回忆童年游艺中，祖父让他们用竹或纸做成诗牌，在每牌的两端分写两个字，在家庭闲暇和宾朋宴集时用于游戏。根据集中诗文推算，金武祥生在道光二十七年，他所言应为咸丰年间的事。孙怪所刊于同治十年的《余墨偶谈》说：“诗牌之戏，于杂剧中为最雅。”



《河峪颂》外景



《河峪颂》原石



《河峪颂》拓片

对于甘肃东部的汉代摩崖石刻，《西狭颂》早已为人熟知，然早于该颂21年的《河峪颂》，至今藏于深山人未识。《河峪颂》位于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镇。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朝廷为确保关陇古道畅通，在恭门镇河峪关设置驿马，史称“河峪关驿”。为抗击羌人与匈奴对汉朝西境的侵扰，东汉汉阳郡太守刘福(字伯寿)下令屯兵恭门镇河峪关。同时，率领民众整修关陇古道，为朝廷度陇西征提供交通便利。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为纪念故太守刘福的历史功勋，由汉阳郡郡吏赵德奉命负责，经吏民通力合作，在恭门镇河峪关东北山麓建造并镌刻该摩崖，将刘福善政亲民之君子之德和施惠于民的显著政绩昭告后世。

《河峪颂》摩崖石刻距今1867年，历代金石著述均无记载。民国方志、金石学家张维(字鸿汀)的《陇

右金石录》虽记载甚夥，亦不见著录。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方被有识者发现，以颂之主人名之，被称为《东汉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因摩崖石刻地处恭门镇河峪关，又依地而名之《河峪关颂》，简称《河峪颂》。该摩崖石刻1987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6月1日，经甘肃省核定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河峪颂》依崖凿刻，刀法干练，劲健质朴，古意盎然，浑脱无拘，虽经两千年风雨而笔意尤在，魅力无穷。

《河峪颂》位于张家川县恭门镇河峪村，在村东东西向的小河北岸，为河流冲积形成的狭长台地，台地北侧为花岗岩质石山，山上岩石风化破碎，生长着新生的茂密松树。在一块较为完整的石面上，刊刻着《河峪摩崖》。《河峪颂》摩崖为花岗岩石质，呈不规则竖长方形，纵130厘米，横102厘米，崖面粗糙，中下部

东汉摩崖石刻

——《河峪颂》——

□ 郎照玉

剥落。阴刻，隶书，正文总共15行，行约18字。正文上端阴刻一较大的[汉]字。正文字径6厘米，结合文献可辨识134字。

在用笔上，《河峪颂》显示出浓重的急就风味。和《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一样，点画没有太多的修饰，典型隶书的垂头雁尾几乎看不到。石匠只是用凿子按照文字的结构刻凿出来，于是在拓片中形成了几乎没有粗细变化，像墨漏痕一样充满篆籀古质感的点画。由于石面不平整，长的点画不能平直，点画的轮廓也是毛而涩的，不能光滑，显得劲拙古拙，率意老辣，极具郁郁勃勃的生命力。

在结构上，以方折为主形成基调，但并不平淡。一方面将有些有圆转主笔的字如“乃”“之”中的圆转以及有些字的车字底处理成方折，以协调基调；一方面却在轮廓方正的字如“守”“约”“迨”中，将原本平

直的点画处理成圆转的弧线形点画，以之对封闭的空间进行分割，形成出其不意的审美效果。字内的短笔画造型活泼，如“刺”“不”“柔”“木”等，形态各异的短笔画在长笔画分割出来的空间中顾盼、跳跃，和曲折的长笔画一起，使整个单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单字的外形虽然以方为主，但并不大小一律，既有可以拉长的字形如“不”“之”“乃”等，使字距缩小，字内空间加大，显得宽博舒展；也有一些竖长的字形如“柔”“喜”等，任其竖长。

章法上总体来说虽然没有明显的界格，但纵有行，横有列，属于典型的铭石书书写风格。如同《裴岑纪功碑》和《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由于行间茂密，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气脉相通，形成了雄浑茂茂，凝重简率的规整之力无法束缚的磅礴气势，这正是汉代人的审美追求。

· 陇道遗珍 ·

